

昨夜西風

郑连根◎著



郑连根◎著

昨夜西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夜西风：那些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 郑连根
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4

ISBN 978 - 7 - 5113 - 1086 - 6

I. ①昨… II. ①郑… III. ①传教士—人物研究—西方国家—近代 IV. ①B97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8800 号

昨夜西风：那些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策 划 王 兴

作 者 郑连根

责任编辑 文 心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150 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3 - 1086 - 6

定 价 25.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 64446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他们是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一度，我们视他们为“文化侵略者”。

可是，随着时光将情绪化的泥沙沉淀，我们发现传教士们在近代中国还干过这样一些事情：在传播基督教之外，他们搞慈善、开医院、办教育、办报纸、翻译西学书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

他们与中国名流交往，交往中发生过许多趣事，这些细节为我们解读那段历史提供了可感可触的鲜活场景。

他们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

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偏见和局限，但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有意“屏蔽”他们的理由。

且让我们正视他们，正视一段近代史中不该忽略的篇章……

本书无意也不想对传教士问题做出“盖棺定论”式的评判，只是想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互动的视角切入，告诉读者一些鲜为人知的传教士故事、现象及相关的发展脉络。

前言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互动

自 1807 年马礼逊来华之后，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对基督教解除了“教禁”，英美法德等国的各个差会几乎都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传教士来华，其重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可是，在传播福音之外，他们还带来了“西学”（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和科技文明）。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很多传教士都采取了“以学辅教”的手段，试图通过传播“西学”来达到宣传“西教”的目的。

概括地讲，传教士传播“西学”的主要手段就是办学、办报（刊）、译书等。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晚清社会的文化图景，而且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创办新式学堂还是创办近代报刊，中国人都是从传教士那里学习、借鉴来的。

“林则徐译报”一直被看作是国人创办报刊的先声，但要知道，林则徐组织人所译的报纸，恰恰就是传教士办的，帮助林则徐翻译报纸的人员也与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魏源一直被国人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看世界的参照物就来自传教士的著作和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堪称当时国人撰写的世界史地著作中的佼佼者，其资料亦

来源于传教士的著述，并且，在搜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还直接得到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帮助。

就教育而言，从恭亲王奕訢创办的同文馆到日后的京师大学堂、从南洋公学到后来遍布各地的教会学校，每一处都有传教士辛劳的身影。翻译图书就更不用说了，传教士们不但把《圣经》翻译成了中文，而且还把中国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介绍到了欧洲。

当然，传教士的大量来华是以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武装侵华做背景的，他们来华所从事的传教及其他文化活动自与平等的文化交流不同。甚至，在某些时候，一些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实际行动（如搜集情报、参与条约谈判等），但是，若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那也显然不合实际，属于简单粗暴之举。

自 19 世纪初至民国成立的百余年间，来华传教士为数众多，虽同为传教士，都信奉上帝，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差会，再加上每个人的学识修养和思想倾向亦有差别，所以，诸多传教士一起描绘的“传教士在晚清”的大幅图景就显得异常复杂，需要做仔细的梳理和分析。这一点，恰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在 19 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被研究最少，但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

最近几年，我在关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新闻史的过程中，屡屡与传教士们的史料不期而遇。史料看多了，就有了梳理、分析的冲动，于是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原本只想写“传教士报刊”这个内容（相对而言，我对近代新闻史比较熟悉），但后来又觉得仅写“传教士报刊”会显得单薄，难以让人把握传教士在晚清社会活动的整体面貌，于是，不得不拉长战线，将传教士办报、办学、译书、与中国名流交往等方面的文化活动一并写出，我想通过这样的梳理，让大家看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互动。

虽然近代来华传教士的问题异常复杂，但他们在不同的时

期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还在实行“教禁”，传教士来华传教是非法活动，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一旦暴露，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杀无赦”。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只能通过化妆、隐瞒身份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学汉语、翻译《圣经》。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马礼逊，为了防止传教士身份被识破，他穿上中国长袍，还留起了长长的辫子，身上还藏着毒药——预备着被抓时服毒自尽。马礼逊的传教士身份当然没有被识破，他后来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由于办刊地点在境外，发行量又不大，这份报纸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份报纸在历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它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报纸，也是传教士报刊的开端。马礼逊之外的传教士的在华经历与他大同小异，鸦片战争之前的来华传教士所做的多是一些基础性、象征性的工作，传教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陆续获得了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基督教会也相应地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力。这个时期，西方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各差会几乎都向中国派遣了他们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建教堂，发展信徒，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活跃在中国社会上。

洪秀全创办“拜上帝教”，发动农民起义，挑战清廷。因为他曾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门下学习基督教，所以，很多传教士一度对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抱有很大期望，以为太平天国政权会有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是，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包括罗孝全在内的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政权深为反感。太平天国所谓的“拜上帝教”不过是借用了上帝的名字而已，洪秀全心中的上帝跟基督教义里的上帝根本不是一回事。

西方列强一度在清政府和太平军之间犹豫，拿不准应该支持谁。传教士们的宣传对西方国家最后做出支持清政府的决

策，起了一定作用。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遂开始搞“洋务”。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之初，通洋文、懂西学的洋务人士非常匮乏。不得已，洋务派只得跟来华传教士合作。不少来华传教士本身就是优秀的学者，对西学非常熟悉，来华之后，又都学会了中文。同时，他们是传教士，身份相对超脱，不太受西方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几种因素凑合在一起，洋务派和传教士之间展开了合作。传教士受聘于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担任教职或者翻译西学书籍。在与洋务派交往的过程中，传教士与洋务派中的很多人成了朋友，他们互相影响。洋务派官员从传教士的身上学习了西学，传教士也通过与中国官员的交往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个阶段，一些著名传教士开始介入到中国社会的赈灾、办学等活动中去，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跟传教士的关系更为密切。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人积极参与变法活动，为维新派出谋划策。在康梁的变法主张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都来自传教士报刊《万国公报》——这份报纸发表了许多评论中国时政、鼓吹中国变法图强的文章。即便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李提摩太还参与了策划营救光绪皇帝的活动。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传教士对中国政局影响最大的一个阶段。

在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不得不与西方列强讲和，并于1901年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新政诏书，启动了旨在变法图强的清末新政。

在清末新政阶段，清廷组建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再次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传教士的身影再次活跃。不过，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会和许多传教士都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发生义和团运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不够。教育不够直接导

致了盲目排外的过激行动。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督教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普遍重视学校教育对国人的思想影响。教会组织办学的愿望契合了清政府创办新式学堂的潮流，两者一拍即合，教会学校由此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在中国开花结果，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对中国的社会风气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人的警觉。20 世纪 20 年代，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也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所以必须予以抛弃。这样就引发了 1922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教育成了双方关注的主要焦点。在爱国主义和仇外反洋情绪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收回教育主权”的口号。到 1924 年，收回教育权已经成为各地反对教会学校的一致舆论。随着“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深入，教会学校开始式微。抗日战争发生后，大批学校西迁，教会学校亦受到战争的很大冲击。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20 世纪 50 年代之初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的历史被彻底终结。

办报、译书、办学，可以说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不同阶段所从事的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事上述活动的传教士在此过程中亦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些传教士来华后对汉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成了汉学家，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为汉学在世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来华传教士，西学进入了中国，还是通过传教士，汉学也逐渐为西方人所知晓。

对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学术界近年来关注颇多，研究角度亦差异极大。有的人认为传教士来华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有的人认为这些传教士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但不管怎么说，来华传教士确实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能忽略

的影响。我不是专门的学者，不求专业建树，更无意对这个问题做“盖棺定论”式的结论。我的看法是，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仍在继续，现在做任何结论都可能为时尚早。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及更多史料的“浮出水面”，客观公正的历史结论终会不请自来。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打捞出一些有关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相关史实，并做一些梳理和分析，以期达到普及之效。

这便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由于才疏学浅，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我的电子信箱是：zlg8998@sina.com。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互动 / 1

第一辑 趣闻与正事 / 1

彼得·伯驾与林则徐的疝气 / 3

罗孝全与洪秀全：从师生到敌人 / 8

徐继畲和雅裨理之间的友谊 / 19

布朗与容闳：开启中国留学之门 / 25

传教士给予王韬的启示 / 32

第二辑 西学与东方 / 39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 41

丁韪良的中国传奇 / 55

李佳白：从传教士到社会活动家 / 65

傅兰雅：从传教士到翻译家 / 77

第三辑 传教与汉学 / 85

传教士倪维思与烟台苹果 / 87

理雅各：从传教士到汉学家 / 92

带枪传教的狄考文 / 97

卫礼贤和他的《中国心灵》 / 103

明恩溥的中国研究 / 107

目 录

CONTENTS

第四辑 报刊与传播 / 115

马礼逊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 117

郭士立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 127

传教士报刊的非宗教化倾向 / 138

互动与转换：“洋报人”林乐知在中国 / 142

第五辑 教育与社会 / 155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 / 157

司徒雷登的若干个前缀词 / 166

教会女校与中国的女子教育 / 180

昨夜西风——教会学校在中国 / 184

附录一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最 / 197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200

彼得·伯驾与林则徐的疝气

彼得·伯驾（Peter Parker）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于1834年10月来到中国澳门和广州，于1835年11月在广州创办了新豆栏医局，这是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由于医院的经费由英、美商人捐助，伯驾在1839年以前一直免费为中国百姓治病。正因如此，在开设的第一年，新豆栏医局就诊治病人2152人次，赢得了中国百姓的信任。更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清朝的官员也慕名请伯驾看病，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林则徐。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州着手禁烟。林则徐本来就有疝气病，来广州后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这一年的7月，林则徐托人与伯驾取得联系，讨教了两件事：其一，西方有无戒鸦片瘾的特效药；其二，能否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答复，没有戒鸦片瘾的特效药，但治疝气病有办法，不过要病人亲自来，因为他要给病人量身定制一个疝气带。这时，有趣的事情出现了，林则徐以为，身为钦差大臣，自己的身体不能轻易地给外国人看，如果再把身体的隐私部位暴露给传教士，那实在是失“官体”的事。所以，就找了个身材和自己相仿的人作替身，派他去见

伯驾。伯驾虽然对林则徐的做法难于理解，但还是给林则徐建了一个编号为 6565 的病历，为其诊断了病情，托人带去了药物和疝气带。经伯驾的治疗后，林则徐的病情明显好转。为表感谢，林则徐派人给伯驾送去了水果。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人们可能就把它仅仅当成一段历史趣闻了。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林则徐在治疗疝气时的表现，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思想局限性的一个象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普遍的观念是：大清国是“天朝上国”，大清国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大清国的皇帝是永远圣明的，而英吉利不过是“蕞尔岛夷”！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人根本不了解西方，不了解人家西方的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更不了解所谓的“西学”和国际法则。

林则徐是道光年间最伟大的政治家，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爱国情怀和实干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仰，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思想观念仍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体现在看疝气上，也体现在他呕心沥血所领导的禁烟运动中。林则徐和他领导的禁烟运动的历史功勋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可是，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所采取的一些“严切手段”在今天看来却大有检讨的必要。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就指出：“他（林则徐）那恳切至诚的精神，我们至今还应该敬仰佩服。但他对外的思想知识，为时代所拘，因之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能不错误，我们不能为他讳饰。他的注意点，专在鸦片一件毒物上面：第一要消灭已经到了广东的鸦片，第二要断绝以后鸦片的来源。凡他认为可以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段，尽量采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李剑农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1839 年 3 月 18 日，刚到广州八天的林则徐就下了两道“谕帖”，命令中外所有商人必须将现存所有鸦片一律上缴，不许有丝毫隐匿；同时要出具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夹带，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第

二天，林则徐又下令，在广州的所有外商，在鸦片未缴清之前一概不许离开广州。随即，在外国人的商馆周围布置卫兵，“稽查出入”，商馆与黄埔、澳门之间的船舶往来也一并截断，不许私通信息。接着，又将外国人所雇佣的中国仆役从英国商馆撤离，于是，所有的英国人均被围困于商馆之内，“形若狱囚”。林则徐以为，把外国商人围禁在商馆之中，他们没有办法，就只能将鸦片交出来了。果然，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迫于形势，通令英商将所有鸦片交出，共20,283箱。这些鸦片后来在虎门销毁。

如此一来，林则徐的第一个目的——消灭已经到广东的鸦片——已然达到。只要英商再写下日后“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整个禁烟运动就可大功告成了。可是，义律坚决不让英商出具这样的保证书。他认为，查出商人夹带鸦片，不经过正常的审判程序，就“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不法行为，与现代的法制观念万万不相容，遂命令英国商人退出广州，移住澳门。然后他在澳门致函林则徐，希望在他没有接到英国政府的训令之前，林则徐能够准许英国商船在澳门起卸货物。这一要求也遭到了林则徐的拒绝，中英关系日趋紧张。

随后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此事成了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7月7日，英国水兵多人到香港附近的尖沙咀买酒，因买酒不成，遂对当地百姓施暴，居民林维喜被殴打致死。事情发生后，中英两国为争夺裁判权再次发生争执。中方以犯罪地点在中国领土为由，要求义律将凶犯交给中国，而义律不肯。林则徐遂沿用嘉庆时期的旧例，对英国人“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以此“压服”英国人。此后不久，战争爆发。

这就涉及到了中英两国在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皇言如纶”，皇帝的命令就是法。相应的，得到皇帝默许的官府的命令也可以成为“新法”，钦差大臣的命令当然就更可以成为“新法”。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不听钦差大臣的命令，“不听吆喝”，几乎就等同于违抗圣旨，所

以“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围禁商馆”、“禁绝柴米”等做法，则不过是为了让你们交出违禁品所采取的措施——“好言相劝你不听，就只好给你来点厉害的了”。这是中国官府办案的常规套路，用“连坐”的办法逼你就范，用追究连带责任的方式使你屈服。鸦片既是英国人贩卖的，英国商馆就该负连带责任，义律尤其应该负“领导责任”，所以“围禁商馆”没什么不对；林维喜是英国人打死的，你义律不肯将凶犯交出，你就是庇护罪犯，自然也该负连带责任，“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又有什么不妥呢？用林则徐奏报给道光皇帝的话说，这不过是“喻以理而怵以威”而已。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也实在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可是，在英国人看来，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命令完全是两回事，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断不能立即构成新罪名，你钦差大臣的一个命令怎么就可以置人于“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境地？此外，判定他人有罪，要有充分的证据，不能在犯罪事实尚未查明之前就随意剥夺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更不可仅凭怀疑就将惩罚加诸某一特定人群。以此来看，林则徐勒令交出鸦片、“围禁商馆”、“禁绝柴米”等做法皆属强暴非法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英国人很愤怒，后果也很严重，1840年春，英国决定对中国出兵，6月英国军舰抵达广东沿海，鸦片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就有人看到了林则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这一缺欠。这个人便是给林则徐治疗过疝气的美国传教士伯驾。1839年7月，他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他首先表达了对林则徐的敬意和对禁烟运动的理解：“（我）在来广州之前，已有许多人称道阁下的清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我自第一次获悉这样一位大臣即将光临，心中感到非常高兴。慈悲的上帝给予他的国家一位拯救者，来消除如此令人忧虑的罪恶。我